



资本主义 文化矛盾

丹尼尔·贝尔著

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译

现代西方
学术文库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丹尼尔·贝尔著

赴一凡 蒲隆 任晓晋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庄 凌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78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ZIBENZHUYI WENHUA MAODUN

〔美〕丹尼尔·贝尔著

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90,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5.05元

ISBN7-108-00152-7/B·42

DH87/15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总 序

近代中国人之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一八六二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五十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后而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至于介绍性的二手著作，则“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另设有“新知文库”（亦含部分篇幅较小的名著），以便读者可两相参照，互为补充。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是所望焉。谨序。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6年6月于北京

思想与行动无尽的循环，
无数的发明，无数的实验，
带来运动着，却不静止的知识，
急于表达，却非沉默寡言的知识，
用词语构成的知识，以及对词语的漠视。

引自T·S·艾略特：《磐石》合唱词



丹尼尔·贝尔（一九八六年标准像，哈佛大学出版社专制）

目 录

中译本绪言：贝尔学术思想评介（赵一凡）	（1）
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	（20）
初版序言	（41）
初版说明	（44）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导论/领域的断裂：主题绪言	（49）
---------------------	------

第 一 部

现代主义的双重羁绊

第一章：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79）
第二章：文化言路的断裂	（134）
第三章：六十年代文化情绪	（169）
第四章：走向大修复：后工业化时代的宗教与 文化	（197）

第 二 部

政治体系的困境

引言：从文化到政治	（227）
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的暂时的和永 久的因素	（229）
第六章：公众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 社会	（276）
译名对照表	（346）

中译本绪言： 贝尔学术思想评介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当代美国重要的学者与思想家。他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据有领先地位。五十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九）和哈佛大学（一九六九至今）担任社会学教授，参与创办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声誉遐迩的刊物《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一九七二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二十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近年来，他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二〇〇〇年委员会”主席，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益高，颇具影响。

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与编撰文集计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九五一）、《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九六〇）、《极端右翼》（一九六四）、《今日资本主义》（一九七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九七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九七六），以及新近发表的《蜿蜒之路》（一九八〇）。上述著作中《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在我国已有译本。这里译成中文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译者征得贝尔教授的许可之后，旨在介绍新知、扩大学术交流的一项努力。

鉴于贝尔的特殊学术地位及其理论上的相对难度，也考虑到

① 评选情况参见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新泽西州：普兰蒂斯-霍尔公司，一九八三年），第五章有关部分。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经典意义，有必要在开卷之首作些背景解说与内容提示，以助我国读者的理解与思考。

一、贝尔的学术思想结构

作为当今美国主要的批判社会学家，贝尔在学术与思想结构上与众不同。用他自己反复强调申明的话来说，他“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②这种“组合型”思想结构已在美国学术界得到承认和重视，并被当作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模式”加以评论。^③但对中国读者而言，贝尔这种思想倾向可能有悖于传统区分标准或“非此即彼”的判断习惯，从而引起困惑或误解。因此，若要比准确地评价贝尔的理论，首要的前提是把握他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冲击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复杂立场。

贝尔与马克思主义 贝尔一九一九年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小随寡母备尝艰辛，又处于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他的家族原姓波诺斯基，后由其叔父改为贝尔），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排犹倾向深有体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革命运动促进了他的思想早熟。十五岁那年他便向拉比宣布他不再信奉上帝，转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街宣讲革命道理。像其他后被称为“纽约文人”的犹太裔进步青年一样，贝尔一度思想激进，在社会与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这不仅驱使他在大学选择了社会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也为他成名之后

^② 见本书“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

^③ 见朗恩·切尔纳：《丹尼尔·贝尔的文化矛盾》，载《变革》杂志一九七三年三月号，第12页。

在同行中博得“精通马克思”的声誉准备了条件。^④

然而，贝尔青年时代的激进经历并未使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课程及任教初期，正值左翼文化运动退潮，大批同路人知识分子因对苏联政策不满，对国际共运幻灭，转而拥护罗斯福新政，肯定并颂扬美国民主传统。四十年代末，以莱昂乃尔·屈瑞林为首的纽约文人暨《党派评论》集团主动引导美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变，重建“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想体系。作为纽约文人中的后起之秀，贝尔积极地参加了战后的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活动，并在总结三十年代左翼运动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即认为美国与西欧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⑤

这一时期贝尔确立了他居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既继承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麦卡锡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⑥又以左翼运动过来人的体验批评社会主义革命的“乌托邦”倾向，主张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平等，藉此“为知识界的适度与自尊确立基调”。^⑦这种带有“激进”色彩的自由派“第三条道路”当然同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但持有这种立场的知识分子往往成为从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力量——贝尔在这一类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贝尔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之间的交错渗透现象有

^④ 有关贝尔身世与早期参加左翼运动的经历，见亚历山大·布洛姆：《宠儿们：纽约文人的世界》（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19—27，41—49页。

^⑤ 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纽约：自由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修订本），第402—403页。参见贝尔为《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书所写序言。

^⑥ 一九六一年，贝尔曾同一批自由派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主编了《极端右翼》一书。

^⑦ 贝尔：“美国的非马克思主义革命”，载《评论》一九四九年三月号。

它深厚的文化与种族渊源。身为移民后代，贝尔在青年时代自认是处在美国文化边缘的“精神漂泊者”。当他同其他纽约文人相继成名之后，又深感“世代流浪，有家难归”的精神焦虑。^⑧犹太思想传统、欧洲文化背景和俄国革命的感召固然给予贝尔重要的思想影响，美国现实生活的启示与吸引却又使他获得与欧洲人不同的比较和批判眼光。这种“身在其中又置之度外”的独特处境，可以说是导致贝尔悬浮超越意识的主要原因。

五十年代之后，贝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采取“非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研究态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承认其学说之于现代社会学的巨大影响，并呼吁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共同探讨未来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他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演进规律时并不以马克思为准，而是将其思想同圣西门、韦伯、凡勃伦、桑巴特、熊彼得等人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作通盘比较，各有取舍，自成一家。

例如他近来闻名于世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便批判吸收了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熊彼得的“创新理论”和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概念。在沿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某些基本观念的同时，贝尔却认为“具体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已突破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依次更迭的“理论图式”；而科技发展和“中间阶级”（指介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专家与白领）的壮大，将引导所有工业化国家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⑨

对此，有些苏联学者曾指责贝尔“反对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⑩在贝尔自己看来，所有涉及资本主义演变的

^⑧ 贝尔：“异化的寓言”，载《星期六评论》，一九五五年六月号，第144页。

^⑨ 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纽约：基础图书公司，一九七三年），导言与第一章有关部分。

^⑩ 参见阿拉勃-奥格莱：《在预言的迷宫里：社会预测与意识形态斗争》（莫斯科，一九七三年）。

现代社会学说都是“同马克思的对话”——既是对话，也就难免争执、冲突以至背逆。虽然贝尔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持有不客气的看法，他仍然愿意自己被人较为客观地称作“后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与他的苏联同行们一视同仁。^①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本专著的批判精神来看，贝尔虽与马克思多有分歧，他在前人基础之上追踪研究，解剖现实，力图有所创新的意图确实较为明显，而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注意。

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如果说五十年代美国知识界“意识形态的终结”导致过一段基本和谐沉稳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统治，那么，经过六十年代政治冲突与文化骚动之后，原以罗斯福—肯尼迪改革哲学为轴心的新政联盟终于在七十年代初宣告破裂，而学术思想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也在内外夹攻下趋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日益强盛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它越来越有力地支配着尼克松与里根时代的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方向。

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既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纲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公众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新保守主义者一反六十年代的过激倾向，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提出一系列偏向节制、冷峻和实际的观点，强调要控制国家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缩减福利开支，抵制过分的平等要求，恢复道德约束与文化秩序，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尊严。

这些形形色色的政策、理论和文化情绪之间充满着矛盾和差异。在被统称为“新保守派”的庞杂阵容里，不但有右翼政客、军方鹰派、宗教领袖、“里根经济学家”及种种“美国中坚”势力的代表，而且包括了一批前自由派学术权威。其中有从纽约文

^① 见贝尔一九七〇年在苏黎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后工业化社会：思想演变过程》，载英国《观察》杂志，一九七一年第二期。

人集群中分离出来的贝尔、波德莱茨、克里斯托和李普塞，以及常在《评论》、《公众利益》和《美国学者》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的著名政论家，如亨廷顿、莫伊尼汉、科帕特里克和诺瓦克等人。^⑫

贝尔与这群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智囊”关系接近，交流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过他们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自由派自我批判活动。但他作为素来审慎的“自由派社会科学家”，对政治“新右翼”和具有反智倾向的原教旨主义平民运动一直怀有戒备和疑惧。另外同那些从自由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的学者相比，贝尔既没有莫伊尼汉、科帕特里克（这二位先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参政热衷，又不同意波德莱茨和诺瓦克等人对资本主义“潜在精神力量”的肯定（后者因此指责贝尔的“社会主义思想比例过大”）。^⑬甚至当被问及《公众利益》的“新保守主义宣言”事件时，他申明那“不过是欧文（·克里斯托）一个人的主意”^⑭——以此与别人拉开间距，保持自己的个人立场。

贝尔之所以反对别人加附于他的“新保守派”标签，认定这种“单一层面上的排队毫无意思”，^⑮同他历来严肃的思想习惯有关。事实上，他每次应时代之变而调整自己的立场时，都注意到前后连贯，平抑偏激。同时扩大视野，以达到新的均衡——这大约是他有别于其他新保守主义理论家的主要特征。

回顾他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化，我们发现贝尔并未远离

^⑫ 美国学者研究新保守主义的主要著作均提出上述名单。参见彼得·斯坦福尔：《新保守主义者》（纽约：一九七四年）第215页；B·Y·派因斯：《回到根本》（纽约：威廉·莫雷公司，一九八二年）第267—269页。通常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哲学代表作的是亨廷顿：《民主政治的危机》（纽约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克里斯托主编的《公众利益》专辑：“美利坚合众国：一九七六年展望”，以及诺瓦克《民主资本主义精神》（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公司，一九八二年），等。

^⑬ 迈克尔·诺瓦克：“阶级、文化与社会”，载《评论》一九八一年七月号。

^⑭ 转引自亚历山大·布洛姆对贝尔的采访记录，见《宠儿们》第372页。贝尔移居哈佛任教后，不再主持《公众利益》日常编务，故有此语。

^⑮ 本书“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

他“中间偏左”的经济社会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尽管他受到了亨廷顿有关“民主政治危机论”的影响，强调要摆平“自由与平等”的关系。^⑮当人们在六十年代对他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提出质疑，并批评他过于排斥理想主义时，贝尔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性变革”立场，反对“意识形态政治”的乌托邦倾向，并确认他所信奉的是一种以公民政治与科学态度为基础的“经验乌托邦”——因为“通往上帝之城的阶梯不是由信仰筑成，而是经验的铺垫”。^⑯

面对六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激进运动，贝尔先是告诫青年勿“将思想当成世俗宗教”，以免引起“社会动乱和暴力行径”；^⑰继而在新左派学潮的猛烈冲击下，以及在有关现代主义反文化的争辩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深沉冷静的“文化保守主义”意识。^⑱

贝尔的这种保守意识与其说是一种立场迁移，不如说它补充并坚定了他原有的多向批判和“有选择地反叛”立场。^⑲随着年龄与地位上升，他已经站在思想精英和文化监护人的位置，对大众文化和平民“解放”运动采取严峻的审查态度，并有意承当对自由主义改革哲学的自我批判任务。从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露针砭，以及注重信仰和权威，维护文明的延续等观点来看，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地传达出他对历史的参悟及一种已臻成

^⑮ 见本书导论与第六章“公共家庭”有关部分。贝尔在此问题上承认民众平等要求的必然性，但主张对其过分蔓延趋势加以节制。

^⑰ 贝尔：“意识形态与时尚举动”，载《异议》一九六一年冬季号，第75页。后收入《意识形态的终结》修订本。

^⑱ 贝尔：“社会规律：当代实用指南”，载《美国学者》一九六六年秋季号，第712页。

^⑲ 一九六八年四月底哥大学潮中，贝尔曾与一批中立派教授试图制止警察与学生间的暴力冲突，结果无效。学潮致使众多师生受伤，校长辞职，并引起纽约文人内部意见分歧。

^⑳ “有选择地反叛”原为屈瑞林的观点，贝尔以它对应比较新左派学生的“无目的造反”。见贝尔：“哥伦比亚大学与新左派”，载《对立》一九六七年十月号，第105页。

熟睿智的思想境界。近年来，他非但不因其“文化保守主义”而感到自相矛盾，^②反而抓紧时间，集毕生精力，要在他多年坚持的三位一体思想原则基础上，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后工业化社会论”和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批判上升改造成一个囊括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综合理论体系。

跨学科研究方法 贝尔的理论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因为他在思想结构中揉合均衡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异体合成”（syncretism，指哲学或宗教上的诸说、诸神混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蓄意打通不同学科壁垒，以思想大家的恢弘气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与未来施行综合研究与预测。

从贝尔近年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即可看出，他既通晓“经典社会学理论来源与发展”，熟知“当代社会学中的关键问题”这一类专业基础课题，又积极主持诸如“政治社会学”、“技术与社会”和“哲学与社会”这样的跨学科研究项目。

作为以社会学为终身专业的学者，贝尔并不满足于象牙塔之内的纯学术研究。他的显著特征是贯通古今理论又不为理论所限，擅长于跟踪现实发展，及时总结修正，提出新概念。在学术兴趣上，他自三十年代起就极重视政治与经济研究。他同纽约文人中众多史学家、政论家、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贝尔的妻子珀尔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学评论家）长期交往、反复撞击的结果，使得他逐步将自己对社会学问题的思考引深到宗教、文艺、伦理、社会心态和历史哲学等不同领域。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两部构成他综合体系的关键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与其深邃的历史意识相得益彰，而他运用人文学科传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现代方法的学术能力已进入自如阶段。

^② 贝尔：“对现代性的反叛”，载《公众利益》一九八五年，第八十一期。

在战后美国学术界分工日细、隔阂严重的局面下，许多学者都曾悲叹大厦倾塌，偶像破碎，往日雄鹰般的宏观研究已为土拔鼠式的狭隘经营所取代，“侏儒学究”的时代很难再产生出十九世纪那样的思想巨人。然而，贝尔却以他学术思想上罕见的组合优势，力图恢复马克思和韦伯时代的社会学崇高地位，建立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综合研究的新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姿态。

贝尔果真有可能建立并完成自己的体系吗？看来他正在锲而不舍，孜孜以求。《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即已反映出他全面探查当代西方（主要是美国）经济技术体制、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另外在学术方法上，他最近也一直非常关注“描述语言”和“分析语言”之间的比较鉴别，试图摈二者之短，创造一种能兼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中介性“社会学图示语言”〔sociographic language〕。在贝尔看来，传统人文学者对“社会世界”〔the lebenswelt〕意义领域的描述性认知，与现代科学家对“物质世界”〔the umwelt〕封闭体系的分析解剖，在方法上日趋冲突，均难涵盖一切。若要使社会学摆脱目前弊端，真正成为横跨于鸿沟之上的包容性学说，必得从马克思、韦伯的经典方法（注重历史主义的概括）和帕累托、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以抽象类型演绎为主）中各取精萃，双管并用，酌情取舍，以期进一步祛除因认识论与研究对象不符所造成的偏差。^②

二、贝尔与资本主义文化批评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里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

^② 贝尔：“领域的断裂：认识论中的两极对立”。原稿曾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波士顿哲学讨论会上宣读，后作未发表阅读件在研究班散发。此处转述或有出入，与贝尔无关。

会的内部结构脱节与断裂问题。他的基本判断是：资本主义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形成它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狭窄定义上的文化，指由文学、艺术、宗教和思想组成的负责诠释人生意义的部门）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这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这种价值观念和品格构造方面的冲突将更加突出，难以扼制——这是贝尔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总体批评的理论出发点。

三领域对立学说 在贝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矛盾已经无法再用某种绝对原则或封闭式整体构造来加以概括。与之相反，他着重强调当代社会的分立和多原则支配性质，并据此立场提出了三大领域对立说。

首先是经济领域。这个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推进作用的基础部门，历经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改造加强，已经发育成一个以严密等级制、精细分工制为特征的自律体系。其中全部活动都严格地遵照“效益原则”运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体系中，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作为代偿，这个日益强大的技术与经济共同体又宽宏无度地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促进社会享乐倾向。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分离独立。在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政治与法律部门）相对弱小，偏重鼓励经济的自由发展。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和政治运动迫使政府集中权力，除去维护社会秩序、仲裁各集团的利益纷争之外，更增加了干预经济生产及分配，处理国际问题的职能，逐渐长成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它的轴心原则，据贝尔断定，是广为派生的“平等”观念——从早先大而化之的人权法案、法律平等说，发展到当今内容具体、无数不包的各种民众应享要求（如种族与性别平等，教育、福利与就业机会均等）。西方各国政府因了这不